

CEIB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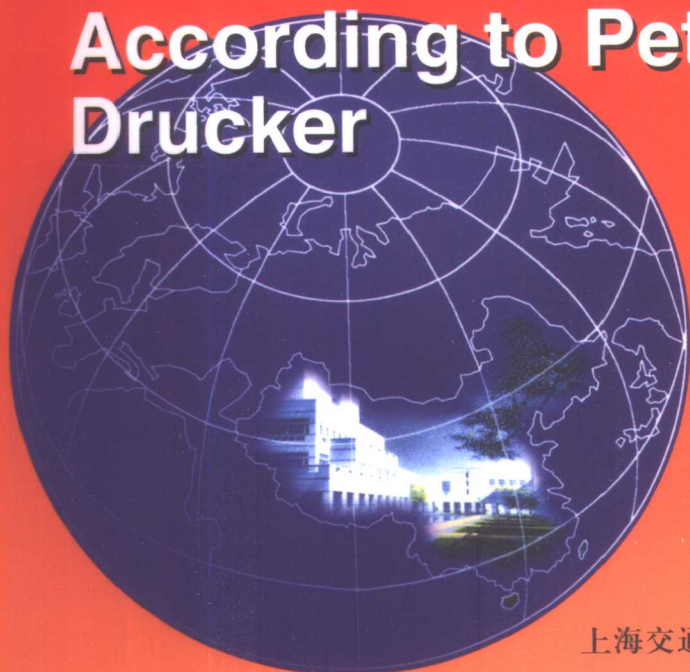
【美】 杰 克·贝 蒂 原著
主编 张国华
贝恩特·施密特

中欧管理新著译丛

管理大师

德鲁克

The World
According to Peter
Drucker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中欧管理新著译丛

管理大师德鲁克

The World According to
Peter Drucker

[美]杰克·贝蒂(Jack Beatty) 著

吴勇 江峰 方小菊 译

周雪林 审校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1999 by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Copyright©1998 by Jack Beatty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Free Press,
A Division of Simon & Schuster In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管理大师德鲁克/(美)贝蒂(Beatty, J.)著;吴勇等译.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1999(2001 重印)

(中欧管理新著译丛)

ISBN 7-313-02191-7

I. 管… II. ①贝… ②吴… III. 德鲁克 - 生平事迹
IV. K837.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16683 号

管理大师德鲁克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番禺路 877 号 邮政编码 200030)

电话:64071208 出版人:张天蔚

常熟市印刷二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mm×1092mm 1/20 印张:8.4 字数:146 千字

1999 年 5 月第 1 版 2001 年 7 月第 3 次印刷

印数:5051~8100

ISBN 7-313-02191-7/K·014 定价:2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出版说明

基于向国内读者介绍国外经营管理的最新学术动向与研究成果的初衷,我们同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合作,共同推出了这套《中欧管理新著译丛》。

收入本套丛书的著作都是国外 1997 年、1998 年出版的最新作品。除了时间“新”这一特点外,内容新也是丛书的一大特色:《管理大师德鲁克》是迄今为止第一本有关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的传记作品;《视觉与感受——营销美学》提出了一个战略性框架,帮助管理者和咨询人员为其组织和品牌规划并实施美学战略;《变革——未来企业》基于沃顿商学院 SEI 研究中心八年的研究成果,前瞻性地描述了 21 世纪企业的运作模式;而《光与影——企业创新》则在对 13 家世界著名跨国公司案例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有关欧洲企业的创新模式,对我国国有企业的转制和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建立及完善也不无启迪。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作者简介

杰克·贝蒂：《大西洋月刊》的高级编辑，曾在该杂志上编辑过彼得·德鲁克的好几篇文章，著有描写爱尔兰裔美国政治家詹姆斯·米歇尔·科雷的传记《草民国王》。

译者简介

吴 勇:1991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外语系,获英语语言文学硕士学位。曾主编教材、编纂词典等。现为上海交通大学外语系讲师。

江 峰:1991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外语系,获英语语言文学硕士学位。现为美国机械制造协会上海联络处经理。

方小菊:1986年毕业于苏州大学,获英语语言文学学士学位。其后分别在扬州大学和上海财经大学进修研究生课程。曾发表论文多篇。现为扬州大学商学院讲师。

《中欧管理新著译丛》总序

吴敬琏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制度的逐渐形成,经营管理类图书愈来愈成为出版界的一个最重要的品类。每年出版的文论书刊数以万计,令人目不暇接。这样,如何在浩瀚的书海中选取最精彩的篇章,就成为有志于提高自己经营能力的经理人员的一件十分伤脑筋的事情。

经理革命(Management Revolution)是20世纪影响最为深远的革命之一。在这场革命中,受雇支薪的专业经理人员逐渐取代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称雄天下、睥睨万众的资本家,成为真正的社会中坚。与之相伴随,管理作为一门适应性很强的学问,也变得越来越枝繁叶茂。管理学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管理学书籍是经理人员经验的升华,也是其中佼佼者业绩的记录。当今之世,从事经营管理工作的人员,如果不从前人的成功与失败的经历中汲取教训,如果不具备经营管理的基本理论知识并且善于在实践中加以运用,要想在激烈的商战中取胜,是断难办到的。问题在于,在20世纪,企业理论和管理科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关于经营管理的出版物数量众多。从世纪初开始,“泰罗制度”、“行为科学”、“管理过程理论”,新的管理学派就像长江后浪推前浪那样层出不穷。二战后以制度分析为基础,管理科学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更是新人辈出,好戏连台。以本世纪的管理学大师德鲁克(Peter F. Drucker)为例,他从1933年23岁时写出第一本书到90年代初

期,出版的重要著作多达 29 部,真正做到了著作等身。更何况全世界管理学专家何止千百。除此而外,还有非经济界人士所写的公司历史、个人传记等等,数量十分惊人。它们既精彩纷呈,却又良莠不齐,使在这个领域中涉足不深的人难以决定取舍。

现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张国华和施密特(B. Schmitt)两位教授利用该学院聚各国管理专家于一堂的优势,精心挑选世界管理著作的精华,编为《中欧管理新著译丛》,分批出版。这是一件大好事。它将有助于管理理论和管理技术的探索者减少自行摸索的困难,更有效地利用自己有限的时间资源从世界管理学宝库中汲取知识。因此,我愿把这套丛书推荐给探索管理奥秘的读者。

序

在任何学科领域(不论是哲学、文学还是物理),总有一些人影响着该领域的发展,使其他人的学术成果相形见绌。没有这些人的真知灼见,他们所在的领域就可能是另外一番情景了。彼得·德鲁克就是管理学领域的影响人物。

他的贡献远不止于此。德鲁克先生不仅仅是这类影响人物中的一员,他还被认为是管理学领域的鼻祖。我们都知道,是德鲁克先生开创了现代管理学。

德鲁克先生于本世纪初出生于奥匈帝国。但他的职业生涯大部分在美国度过。现在他在加利福尼亚生活和工作。

本书是一本有关他的传记。为什么要在本套丛书中选入这本传记呢?原因有好几个:首先,如果你不熟悉他的著述,那么你从本书对这些著作的总结中就可以感受到他的核心管理思想和重要贡献。第二,你可以了解到他是如何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变革、个人生涯以及在公司的工作中发展自己的管理思想。最后,作者在本书中将德鲁克先生作为一个活生生的普通人向读者介绍,从而使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这位欧洲和美国的重要管理学思想家的思维轨迹。请在管理思想的海洋里尽情遨游吧!

张国华

贝恩特·施密特

1999年1月于上海

目 录

第 1 章	奇特的教育·····	1
第 2 章	“写作是我的一切”·····	15
第 3 章	寻找一个崭新的社会·····	27
第 4 章	深入通用汽车公司内部·····	41
第 5 章	20 世纪动荡的基本因素·····	58
第 6 章	管理学理论的诞生·····	84
第 7 章	断层时代·····	111
第 8 章	带上你自己的大砍刀·····	130
第 9 章	上帝不需要管理咨询顾问·····	148

第 1 章 奇特的教育

彼得·德鲁克最早的记忆捕捉到了 20 世纪最糟糕的一刻。他当时正在父亲书房上面的儿童浴室内,有三个声音通过热水管道传入他的耳中。一个是他父亲的声音,他在奥匈政府经济部任高级公务员;第二个声音是他叔叔的,他是维也纳首屈一指的法学家;第三个声音是托马斯·马萨里克的,日后他成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总统。不满五岁的彼得清楚地听到其中的一位说道:“这不光是奥地利的末日,也是文明的末日。”时值 1914 年 8 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开始。

那年初夏,德鲁克一家——他的父亲阿道夫、母亲卡罗琳和他的弟弟格哈特——到亚得里亚海滨享受一次计划已久的假期。他们刚在海滨安顿下来,就传来了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的消息。刺客是一名以独立国家塞尔维亚为据点进行活动的恐怖分子(尽管事后发现他并不是为塞尔维亚而搞刺杀行动的)。塞尔维亚与波斯尼亚接壤,自 1908 年起,波斯尼亚就是奥匈帝国的一个省份。塞尔维亚受俄国的保护,俄国又与法国缔结了条约;同样,法国与英国、奥匈跟德国相互之间都订立了条约。维也纳的唯战派抓住这次刺杀事件,坚持把罪责推在塞尔维亚身上,想以此为借口征服塞尔维亚,实现其蓄谋已久的帝国目标。然而,错综复杂的联盟关系使这一矛盾无法只局限于巴尔干半岛各国这个范围之内,奥地利对塞尔维亚的任何报复都有导致欧洲大战的危险。

阿道夫·德鲁克的一位同僚给他发了一份电报,催促他速回维也纳,以阻止事态急剧发展演变为战争。(这当然是阿道夫后来告诉儿子的,因为孩子对那次假期的印象很模糊,只记得母亲那件滑稽的浴衣)阿道夫说,高级公务员阶层中那些“被称为自由派及和平派”的人认为,自己有责任“向部长们进行游说,向政客们进行劝说,并排除老臣们的阻力向同样年迈的国王进谏”,目的是要阻止灾难的发生。可他们失败了: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并炮轰塞国首都贝尔格莱德,由此划着了一根灾难性的火柴。

战争给彼得·德鲁克的童年带来了阴影,但是,也给他的写作生涯带来了好处,这一点我们以后就会看到。他和朋友们“浏览带有粗黑边框的阵亡人员名单和讣告,从中寻找我们认识的名字——那些我们热爱和思念的人的名字,由此学会了认字”。对他们来说,战争是这个世界永久的状态。“我们中没人能够料到战争终究会结束,”德鲁克回忆道,“事实上,与我年龄相仿的每一个男孩都知道,‘长大’就意味着‘我应征入伍并被送上前线的那一天’。”

若干年后,当德鲁克读高中时,老师给他的班级布置了一项作业,即阅读首批有关战争的书籍。“当我们在班上对这些书进行讨论时,我的一位同学问道:‘每一本书都说大战是一场彻底的军事无能的战争。为什么要这样说呢?’我们的老师不假思索立即回答道:‘因为战死的将军还不够多。他们呆在远离前线的地方,让别人去打仗,去送死。’”在这一点上,德鲁克这代人和这些将军们有着某种共同之处。他们也是侥幸免遭劫难的。德鲁克也意识到他运气不错,因年龄尚小而不用去给那些杀人不眨眼的无能的将军们当炮灰。他在《未来的里程碑》(Landmarks of Tomorrow)(1959)一书中写道:“我们这些逃过了那个年代特有恐怖的人,我们这些从未遭受过整场战争、集中营或者警察暴行折磨的人,不仅应心存感激,而且还应抱有一份宽恕和怜悯。”

如果说战争带来的是恐惧,那么和平带来的则是饥饿。1919年至1920年的那个冬天特别阴冷。德鲁克在他那部才华横溢的自传《旁观者的历险》(Adventures of a Bystander)(1979)中写道:“像每个维也纳孩子一样,我也是赫伯特·胡佛救的。他的食物赈济组织提供

了学校午餐,这些午餐使我后来一直对粥和可可茶厌恶之极——但是毫无疑问,这些东西拯救了我的生命,也拯救了欧洲大陆数百万孩子们的生命。”这些好事都是由一个“组织”所为。从中,人们可以看到德鲁克把组织看作一种人类创造性工具这一概念的形成根源。

值得一提的是,胡佛慈善机构同时也是“管理”上的成功典范,尽管这个具有现代含义的词在当时还不为人知。我们将会看到,彼得·德鲁克将对世界上最大的组织之一——通用汽车公司进行剖析,对历史上第一个“组织社会”以及管理在该社会中的作用开始了毕生的探索。另外,在“经理”的身上,德鲁克将看到他作为未被世人认识的、现代化的始作俑者的一面,作为与令人顶礼膜拜的艺术大师相提并论的文化英雄的一面。

德鲁克一家住在维也纳郊区一幢造型别致的房子里。这幢房子是由维也纳一位著名的建筑师为他们建造的。站在自己第一间成人房间里,透过屋檐下折线形窗户,越过当地的葡萄园,彼得可以看到维也纳森林的山丘。德鲁克夫妇算得上是“上流阶层”的职业人员:阿道夫是一位经济学家和律师,卡罗琳学过医学——这在当时的奥地利妇女中是相当少有的。他们跟孩子们分享他们的职业兴趣。“我父亲每个星期一都要举办宴会,”德鲁克说,“赴宴的常常是经济学家,有身份的公务员,甚至是一位声名显赫的国际大律师。”在每个星期的后半周,德鲁克的母亲会举办一次医学宴会,还有音乐宴会(因为他的祖母是由古斯塔夫·马勒任指挥的维也纳爱乐乐团的独奏演员)和文学宴会。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居然还有数学宴会,“我的父母亲对数学和哲学都有浓厚的兴趣”。真想不到微积分居然还能跟宴饮交际联系在一起。

在一次宴会上,他听到一位医学权威对当时维也纳最出名的弗洛伊德进行抨击,说他对饱受痛苦折磨的病人们冷酷无情、无动于衷。这位医学权威认为医生应做一名具有同情心的治疗者,而弗洛伊德却违背了这一“神圣职责”。在另一次宴会上,一位“温和的亲弗洛伊德”心理学家跟注定要到普林斯顿成为“最杰出的统计理论权威”的年轻的奥斯卡·摩根斯顿辩论,辩论的内容是一项有关心理分析学的治疗功效研究。心理学家说该项研究显示了大有希望的结果。

果,而摩根斯顿则提出了一种统计学上的异议:“事实并非如此,如果你根据数据来判断,那么你就会发现病人根本就没有心理疾病,或者病人对任何治疗方法都相信。是这种信任让病人感到好受些的,实际跟治疗方法本身毫无关系。”对此,另一位赴宴的外科医生(不可避免地)作出了反应:“不管是哪种情况,都仍然没有一种有效的弗洛伊德式心理疗法可供医生心安理得地推荐或采用。”德鲁克运用科学方面的比喻、特别是医学比喻的偏好使人感到好奇,但他们只要看看这些宴会便不难理解了。

他的文学比喻——诸如在讨论军事技术发展时用简·奥斯丁的话巧妙点题,或者在讨论工业劳动阶级的话题时引用亨利·詹姆斯的一些看似无关的片言只语——都发源于类似的社会文化源泉。除了平时在家里常受到这些崇高精神食粮的哺育之外,年轻的彼得还是一家沙龙的常客,沙龙的主持人是德鲁克夫妇最要好的朋友。在那儿,他聆听美国记者多萝西·汤普森讨论时事,目睹以后成为“抵抗希特勒核心人物”的赫尔穆特·毛奇伯爵一展“天才领袖之魅力”,还乏味地听过托马斯·曼朗读他的短篇小说《错乱与早来的伤悲》。每逢圣诞节和新年,维也纳一流的女演员玛丽亚·米勒便与德鲁克一家共进晚餐,她会背诵希腊悲剧、歌德、席勒的诗歌片断,也会用英语背诵莎士比亚剧作的精彩片断,如“《李尔王》、《暴风雨》以及——她最喜欢的也是我最喜欢的——《辛白林》”。此时,彼得犹如品味丰富的文化大餐。

在他的游戏伙伴中,德鲁克也不乏充满智慧的少年朋友。“一天,我们在玩一个‘长大后干什么?’的游戏。我们有的说当警察,有的说当消防队员——但是古斯塔夫却说,‘我要做一名研究伊斯兰教的大学教授。’把我唬得目瞪口呆,因为我知道古斯塔夫会说到做到。”后来古斯塔夫确实成了芝加哥大学研究伊斯兰教的教授。

即使德鲁克从来没有进过学校大门,他仍然能通过耳朵、借助于萦绕在他周围的不同语言的高谈阔论、耳濡目染而受到极好的教育。除了接受大量的这种秘教式的知识之外,这些场合还使他学到了一种悠闲从容的成熟风格,这种风格成为他作品的显著特点。学识成为他的思想乐趣,成为一种他跟读者共同分享的礼物,而不是自命不

凡的资本。德鲁克夫妇培养出的是一名有知识的人,而不是一位学究。

60年以来,德鲁克每隔三四年就要拣起一个新课题,然后阅读与这一课题有关的书籍,来尽可能地满足他的求知欲。某一年的课题也许是日本艺术,对此他曾经在波莫纳大学作过六年的兼职讲课;另一年的课题可能是16世纪的金融学;再一年可能又是技术发展史或者劳动发展史——或者是美国政治家史,抑或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史。他主张把博览群书作为自我知识更新的方法。对他而言,这种方法无疑是管用的。最近一期的《福布斯》在封面上刊登了德鲁克的照片,并打出了近乎花言巧语的标题——“依然是最年轻的头脑”。德鲁克广泛的阅读也使他的写作受益匪浅。其他“管理学大师”很少有人能够用这样的片断来为文章段落增光添采:“在原来的阿拉伯语中,‘风险’一词意为‘自己每天挣饭吃’,这可不是巧合。”(这一点你还记得吗?)《经济学家》杂志写道:“只有从德鲁克那里,你才会了解到第一次管理会议是由德国邮政局于1882年组织召开的——而且到会者为零这样的知识。”德鲁克更大的特点是对历史类比手法的运用,而且比喻往往用得恰到好处。因此,在探讨如何采取措施来阻止对“跨国生态环境”的污染时,他写道:“通过跨国行动,19世纪摆脱了人类两项最古老的灾祸:奴隶买卖和公海海盗。”正如19世纪打击海盗那样,21世纪可以制止污染。德鲁克的著作能够教育人,毕竟,他首先是一名教师。

他是在四年级时“染上不可救药的教书瘾”的,那时他是埃尔莎小姐和索菲小姐的得意门生。这两位小姐是修女,在一所私立学校教书,德鲁克的父母把德鲁克从州立学校转到这所学校是为了挽救他的书法。索菲小姐是两位修女中较为热情的一位,她是一位教育改革者。她教男孩们烹调和缝纫,教女孩们使用榔头和锯子,这在当时是“革命性的主张”;而这种主张也是德鲁克家中的规矩——在家里由卡罗琳对付小修小补,包括当管道工和泥水工。如果说埃尔莎小姐给予的是简短鼓励的话(如“比上周有进步”),索菲小姐则抱以微笑——“这是她表扬的唯一方式,但是对看到的人来说,这种微笑却是莫大的喜悦”。

埃尔莎小姐身穿令人生畏的黑色细斜纹披风,这使她看起来像只“大甲壳虫”,加上夹鼻眼镜和长统靴,她看起来是很严厉的。不过,“……我们崇拜她,”德鲁克说,“50年之后,妇女解放运动者声称上帝其实是个女的,对此我一点也不惊讶。”

埃尔莎小姐设计了一种方法,让彼得自己负责自己的学习。她给了他一本笔记本,要求他在每周开始时记下他想学的东西,然后在每周结束时对照预期目标来检查结果。(看起来,“目标管理”这个后来成为德鲁克专利的管理概念,似乎是由埃尔莎小姐发明的。)到四年级时,彼得已显示出当作家的潜力。他说:“我很早就知道,写作将是我可能干得出色的一件事——也许是唯一的一件事。”认识到他的优点,并且为了加强这一优点,埃尔莎小姐让他每周写两篇作文,一篇由她命题,另一篇的题目则由他自定。通过在他擅长的方面如此下功夫,埃尔莎小姐首先形成了一种信条,而这一信条正是50多年来德鲁克一直向高级管理人员传授的:要扬长避短。而学校往往注重问题而不注重优点,结果“大家不知道自己擅长什么,因为没人鼓励他们去这样想。而这也许正是我作为一个教师和一个顾问的最大的长处——我会立即发掘个人的特长”。德鲁克把自己的学习方法加以总结并推广给其他人。“至少我感到我不用从失败中学习。我必须从成功中学习。”

德鲁克是第一个提出“知识工人”这一名词的人,也是第一个对新兴的“知识社会”进行描绘的人。然而,他又警告人们不要产生只认文凭不认人的新“官僚作风”。“靠校长为你选送管理人员,”(当时这种趋势还只是初显端倪)他在1950年出版的《崭新的社会》(The New Society)一书中写道,“企业将会把它最紧缺的人才拒之门外:企业家、革新家和冒险家。”40年之后,在《新现实》(The New Realities)中,他借用历史典故提出了同样的观点,而那时这一观点已成为老生常谈了:“否则,戈特利布·戴姆勒也好,亨利·福特也好,没有工程技术文凭或者MBA文凭,都没有机会坐上第一把交椅。而且,也没有哪家有名的金融公司会在今天聘用J·P·摩根这位从‘大学退学’的家伙了。”

上过多长时间的学或者上过什么学校,这都不重要,只有工作表

现才是对雇员唯一公正的检验。然而,越来越多的情况是,假如没有去收费昂贵的、林林总总的学校里签过到(而且不止一次地签到),那么你根本成不了雇员。美国的商界一直是美国民主气氛最为浓厚的前台,平凡之辈总有机会干出不平凡的事情。要在商界成功,你不必非得上过哈佛大学;事实上,这反而会对你有所不利。就在距今不远的20世纪50年代中期,有人在跟德鲁克提到西尔斯百货公司的一位高级经理时曾这样说:“虽说他上的是哈佛大学法学院,但还是在西尔斯百货公司得到了提拔。”但是,美国商界这种主张人人平等的传统正在被愈演愈烈的“形式主义的管理阶层精英化”所侵蚀,这种趋势让德鲁克担心。

虽然彼得没能在书法上有所提高,但是在其他方面倒是有了长足的发展,于是埃尔莎小姐敦促德鲁克夫妇让他跳过五年级,直接从四年级进入一所公立拉丁语高级中学学习。高级中学的学习仅给彼得的记忆能力带来了些挑战。“我花了八年功夫……学习拉丁语中的不规则动词……没有哪位教师会鼓励我们去读贺拉斯(古罗马诗人)或者塔西佗(古罗马历史学家)的著作,要读的话也只是为了找出其中的语法错误。”德鲁克为了排遣这种单调生活,“就在桌子下面读一些历史书和世界文学巨著”。

不过,在这些年中,至少有一位教师令人难忘。德鲁克13岁时,有一位“循循善诱的宗教老师”给他上了一次难能可贵的人生课,他问每个学生他们想靠什么让人们记住自己。当然,学生们年纪太小,回答不出来。“于是他笑着说,‘我也不指望你们能回答得出。但是,假如你们活到50岁还答不上来的话,那你将已经虚度人生了。’”从此以后,德鲁克一直力争按照这一存在主义的崇高人生准则去生活。“我一直拿这个问题来问自己……这是一个能够促使你不断更新自己的问题——因为它促使你把自己看作一个不同的人,看作你能成为的那种人。”

那时候,德鲁克一直想离开维也纳。所以当他一有机会,即在他从高级中学读完书之后,就出行了。维也纳曾经是一个有5000万人口、国土从阿尔卑斯山绵延至俄国边境、地域辽阔而又多姿多彩的帝国的首都,而战后的维也纳,却像英国历史学家A·J·P·泰勒笔下所